

จุดเด่นและคุณูปการ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ตัวอย่างจากกูหงหมิงและค่อซิมบี้

เหอ เช่อ

คณะ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สงขลานครินทร์
ke.h@phuket.psu.ac.th

บทคัดย่อ

กูหงหมิงและค่อซิมบี้ (พระยารัษฎานุประดิษฐ์มหิศรภักดี) 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ที่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ต่างก็เป็นชาวจีนฮกเกี้ยนที่เกิดในภูมิภาคนี้ในช่วงกลางคริสต์ศตวรรษที่ 19 ภายใต้ยุคที่วัฒนธรรมตะวันตกหลั่งไหลเข้ามาเผยแพร่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 กูหงหมิงได้ใช้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อย่างแรงกล้าในการเผยแพร่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งเดิม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ปสู่โลกตะวันตกผ่า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ารแปล 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 และกลวิธีทางการทูต ในขณะที่ค่อซิมบี้กลับเปิด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ระบบที่ก้าวหน้าของตะวันตก มีความวิริยะอุตสาหะในการอุทิศตน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สังคมของพื้นที่ภาคใต้ของไทย ทั้งสองท่านต่างก็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เอกลักษณ์ที่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และบทบาทต่อ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ระดับนานาชาติ ในยุคสมัยปัจจุบั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คือพื้นที่ใจกลาง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 “หนึ่งแถบ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ซึ่งริเริ่มโดยรัฐบาลจีน ซึ่งสะท้อนถึ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ใกล้ชิดมากยิ่งขึ้น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บทความนี้ใช้การวิจัยทาง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

เอกสาร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อาศัยการศึกษาจาก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เป็นพื้นฐานสู่การนำไปปฏิบัติ ซึ่งสรุปผลได้ว่า 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มีจุดเด่นในการเปิด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น มีทักษะใ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 และมีการสร้างเครือข่าย ชาวจีนเหล่านี้ไม่เพียงแต่จ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 “หนึ่งแถบ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เท่านั้น แต่ยังมีคุณูปการต่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และ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ต่อภูมิภาคนี้และในระดับโลกอีกด้วย

คำสำคัญ: กุหลาบหมิง คอซิมบี้ 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เอเชียอาคเนย์ หนึ่งแถบหนึ่งเส้นทาง

Advantages and Contribu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ake Koh Hong Beng and Khaw Sim Bee as Examples

He Ke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ke.h@phuket.psu.ac.th

Abstract

Koh Hong Beng and Khaw Sim Bee were two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oth of them were born in Southeast Asia in 1850s, and at their time,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Koh Hong Beng spared no effort to introduce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by means of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diplomacy; Khaw Sim Bee was receptive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advanced systems, contributing a lot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iam. They reflect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ir outstan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Nowadays, ASEAN countries are in key positions of China-proposed “B & R” initia-

tive, while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getting closer. So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dopting historical study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s the major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the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v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tolerance, economic strength and organizational network, by which they will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B & R” initiative, but inject new positive energy in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development.

Keywords: Koh Hong Beng; Khaw Sim Bee; overseas Chinese; Southeast Asia; B & R

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和贡献 ——以辜鸿铭和许心美为例

何可

宋卡王子大学国际研究学院

ke.h@phuket.psu.ac.th

摘要

辜鸿铭与许心美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两人同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年出生于东南亚的福建籍华人。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国际大环境下，辜鸿铭通过翻译、写作、外交等手段不遗余力地将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许心美则包容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先进的制度，勤勉实干，为暹罗南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他们二人集中反映了东南亚华人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突出作用。当今世界，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合作正日趋紧密，所以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采取历史研究和文献分析的方法，旨在以史为鉴，启迪现实，并得出如下结论：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具有文化包容、经济实力雄厚、组织网络的优势，他们不仅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中发

挥重要作用，还会为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辜鸿铭；许心美；华人华侨；东南亚；一带一路

一、20世纪前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概述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和海商贸易息息相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初，中国海商便已前往东南亚从事贸易。及至盛唐时期，因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朝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华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尚存各处的唐人街 China town 便是一明证。宋元时期，因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华商开始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多的百姓投身于航海贸易，其中有不少人因此留居东南亚一带。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浩荡船队途经东南亚各地时，明朝官兵就已经发现当地有人数众多的华人。明朝后期起中国的海外贸易由盛转衰，历代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的百姓出国。尽管如此，在明清两朝，东南沿海不堪战乱和饥荒的中国百姓及没落的权贵还是会设法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在地理上易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依据庄国土（1992）的考查，直至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依托海外华商网络而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总计150万人左右。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下南洋”蔚然成风。“南洋”这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涵盖了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等地。庄国土（2008）在其研究中发现，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这波华人移民东南亚大潮以契约华工为移民主体，这个时期中国人“下南洋”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当时的南洋诸国大多为英国、荷兰、西班牙的殖民地（泰国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性勤而耐苦，价廉而易致”的华工成为最理想的劳

动力。此时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又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取消了海禁政策，允许华人劳工出洋。加上海上交通日益便利，因而大批华人移民得以涌入东南亚地区。除了契约华工外，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还有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行业。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是如今海外华人最集中也是人数最多的地区。早在2002年就有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约3000万华侨华人中，留在东南亚各国的就有约2452万人，约占总量的70%以上（盛毅&任振宇，2015）。千百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与当地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些边缘的、来自华南沿海的贫穷的移民华人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一部分人成为富有的工商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互动的开拓者与主要角色（吴小安，2005）。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为大多数，这是因为闽粤二省海岸线曲折绵延，且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交通费用较省。本文选取了两位福建籍的近代杰出的东南亚华人代表——辜鸿铭和许心美，主要采用文献梳理和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旨在展示东南亚华人华侨自身具备的独特优势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互动方面做出过的突出贡献。此外，本文也力图说明：对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研究分析对当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以辜鸿铭及许心美为例

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的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写过一

首诗，该诗生动记述了老一辈的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地披荆斩棘、开荒拓疆的艰辛历程。该诗云：华人渡海初，无异凿空凿。团焦始蜗庐，周防渐虎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陈小二 & 陈宇峰，1995）。华人华侨离乡别井，到海外谋生，没有勇气和毅力不成。此外，正如朱杰勤（2008）所说，华人华侨是中国民族中优秀分子，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国历史或地方史，绕不开华侨，华人华侨史也是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部分。本文撷取的两位历史人物—辜鸿铭和许心美，可谓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同为福建籍的华人，几乎同年出生于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两人都擅长外语，通晓东西文化，并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1.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又名辜汤生，字鸿铭，英文名叫 Thomson 或写作 Koh Hong-Beng。他自称“东西南北人”，这是因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其中的“南洋”指辜出生的马来亚，“西洋”指其留学的欧洲，“东洋”指日本，“北洋”指他曾工作过的北洋系政府。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1857年出生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槟城，槟城亦称“槟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联邦州之一，位于西马来西亚西北部，英文名Penang。其父辜紫云是福建籍华侨，为英国人布朗Brown经营橡胶园，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

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英国商人布朗前往欧洲游历学习，临行前辜父告诫他永远别忘自己是中国人。

1880年，辜鸿铭结束了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在欧

洲求学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外语，还在多国的多所大学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此时的他会说9种语言。

1881年，辜鸿铭辞去其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工作，转而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从此开始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嘲讽西学。

1885年，辜鸿铭首次前往中国，被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此后辜在张之洞的幕府工作达二十余年，在兴办高等教育及处理外交事务上多有出色表现。比如：辜曾任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前身）的方言教习。1891年，俄罗斯皇储来华，因辜鸿铭精通外语和各国外交礼仪，俄皇储赠其镶皇冠金表（罗振玉，1931）。

1908年，辜鸿铭任清政府外交部侍郎。

1910年，辜鸿铭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3年，辜鸿铭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辜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国文学。这一年，他用英文写作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名《春秋大义》）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文明拯救西方论”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生于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少年时游学于欧洲，成年后又到中国为满清政府服务。从辜氏的生平事迹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尤其是外语能力超群，而且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人称“长于西文

西学而服膺古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辜鸿铭被称为“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对中国传统文化几近痴迷。难能可贵的是，在辜鸿铭的时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转而大力学习、推广西方文明。在如此西风东渐的大环境下，辜鸿铭却不人云亦云，他有着南洋华人普遍的冷静包容和文化自信，并凭借自身扎实的外语功力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文明。辜鸿铭通过用英文写作、讲演、翻译中国古籍等方式向西方推广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诚如罗振玉（1931）所说：“乃译四子书，及我国典制诸书为欧文。每一脱稿，列国争传译”。出于其自身在英属殖民地及游学欧洲的经历，辜鸿铭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有缺陷和不公，他对中华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反而更为推崇。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度让西方“群悟东方学术之可贵，各国大学乃争设东方学讲座”，西方人因而了解、进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可见辜鸿铭对东西文化交流所做的杰出贡献。

有趣的是，辜鸿铭学贯中西，可本人却成为一种文化冲突的符号。他因言行怪诞、特立独行而被称为“清末怪杰”。辜鸿铭虽然身为华侨并且接受了大量的西式教育，但是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比如：一方面，他认同西方的民主，吃西餐，赞美女性。另一方面，他留辫子，以清朝遗老自居，反对共和，为封建专制辩护，鼓吹一夫多妻。他还赞同女人裹脚。但不容置疑的是，辜鸿铭是一个具有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与融合大背景的、地区有过广泛影响的华人，也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2. 泰国橡胶之父——许心美 (1856-1913)

许心美，名字英文拼写为 Khaw Sim Bee，1856 年出生于暹罗南部的拉依府（英文拼写为Ranong）。其父许泗璋（1797-1882），英文名 Khaw Soo Cheang，原籍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Skinner, 1957)。据考证许泗璋于1810年前后下南洋，起初在马来亚的檳城和暹罗南部各府间做小宗贸易 (Purcell, 1948)。后经商成功，因能力出众受到暹罗拉玛王朝三世皇赏识，并被委任为拉依府税务官。后又因开发暹南锡矿有功被委任为拉依府府尹，1862年被四世皇赐予侯爵 (Phraya) 爵位。据相关研究表明，许泗璋是暹罗王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府尹的外国人 (Wang, 1959)。许心美是许泗璋最小的儿子，其母为暹罗人。

1867年，许心美随父亲回到中国，然后在福建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几种汉语方言。

1871年，许心美返回暹罗，因其父兄都活跃在暹罗政商两界，许心美便在父兄的引领下学习经商和行政，并逐渐展示出卓越的才能。

1882年，许心美经兄长许心广的推荐，以拉依府府尹助理的身份正式踏入暹罗政界，并受封子爵 (Luang)。

1885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暹南甲武里府 (Kraburi) 府尹，同时被晋升为伯爵 (Phra)。

1890年，因为在甲武里府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执政才能，许心美被暹罗五世皇任命为暹罗南部较重要的董里府 (Trang) 府尹，并再次晋封为侯爵 (Phraya)。

1900年，许心美被任命为普吉大区的最高长官 (High Commissioner of Monthon Phuket)，普吉大区包括Phuket普吉，Thalang

他郎, Ranong 拉依, Phang-Nga 攀牙, Takuapa 达古巴, Krabi 甲米, Satun 沙墩一共7个府(Mackay, 2012)。

1901年, 许心美正式接任普吉大区行政长官, 这一年他在去曼谷述职时剪去发辮, 正式加入暹罗国籍 (Skinner, 1957)。就任之后, 他把马来亚檳城的治理经验和方法运用在普吉大区的建设上。许心美在任上锐意进取、修建公路整顿治安、建设城市、发展锡矿等工业, 并加强普吉大区和檳城之间的贸易物流, 把普吉岛从一个落后荒蛮的地方变成一个外国商贾乐于投资置业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Khoo, 2009)。这时候, 许心美除了担任政府公职外, 其家族企业还经营航运、锡矿、保险等生意, 许氏家族在马来亚檳城的Koe Guan (高源) 公司当时是英属马六甲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同时他们的 Khean Guan 保险公司也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Cushman, 1991)。因此, 许心美在暹南、檳城乃至整个马来亚地区都享有盛名。

1913年2月25日, 许心美在董里府遇刺。同年4月10日, 许心美在其马来亚檳城的住宅内逝世, 享年57岁 (Lim, 2011)。同年5月17日, 许心美的遗体被运回暹南拉依府, 6月1日, 被风光厚葬在暹罗王室赐予的许氏家族墓地 (Dunlop, 1913)。

许心美对暹罗南部最大的贡献是1901年在他主导下的橡胶树种的引进, 因此他还被尊称为“泰国橡胶之父”。依据董里府良当县政府 (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 2014年的网站贴文, 正是在许心美的引领下, 橡胶树种从印尼的苏门达腊被引进到暹罗南部并得到了推广种植。他鼓励地方官员分发橡胶种苗让更多农民种植。他还劝说曼谷政府改变法律, 允许农民砍伐丛林然后种植橡胶; 又从檳城招请华人胶农来到董里, 广种橡胶树 (Mackay, 2012)。在他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 董里乃至整个普吉大区的许多荒地, 逐渐变成

大片橡胶园 (Liang, 2013)。20世纪初橡胶价格的飞涨证明了许心美的远见卓识。如今，橡胶和大米、柚木、锡砂早已成为泰国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当年从印尼带回来的一棵橡胶树种至今仍屹立在艮当县许氏老宅的门前，向后人诉说着这一段历史。1950年，为表彰许心美引进橡胶树种并推广种植的功绩，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董里府为他建立了一尊铜像。

除了橡胶种植业，许心美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暹南锡矿开采业的发展。1906年，他促成了名为 Tongkah Harbour Tin Dredging Company, NL. 的锡矿挖掘公司的成立，他邀请澳大利亚人 Edward Thomas Miles 来经营并提供技术支持，还授予后者在普吉镇 Tongkah Harbour 25 年期的独家开采权 (Cushman, 1991)。经过该公司改造和调试后的斗链式挖掘机 (bucket-dredge) 极大地提高了普吉地区的锡矿开采效率，并对后来整个泰国的锡矿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Yip, 1969)。1969年11月28日，在名为“milestone”的挖掘机雕塑的揭幕仪式上，泰国矿业资源部部长称赞了曾经对泰国锡矿业贡献卓著的三个人，许心美位居其一。部长声称：正是许心美的“创新思维”促进了该产业在泰国的发展 (Cushman, 1991)。

许心美因其出色的政绩和对暹南经济发展的贡献，曾得到暹罗王室的多次嘉奖，并被授予“Phraya Rasada”的爵位，同时他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也深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和他的家族从当时较暹罗先进的英属槟城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制度，发展了暹南经济，有效地抵御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经济渗透。在他死后，暹罗王室给拉依府许氏赐姓为“Na Ranong”，以表示对其和其家族功绩的肯定。

三、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优势分析

辜鸿铭和许心美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杰出代表，他们一个精通中西文化，在外交文教上颇有建树；另一个勤勉务实，开拓进取，为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此外，从此二人身上可以归纳出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三点普遍优势。

首先是文化包容的优势。东南亚地区历来种族众多，文化多元，这个地区的华人华侨习惯融入其他文化，习惯了各种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与中国国内的民众相比，东南亚华人华侨由于长期的跨国、跨民族、多层次交融的经历，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成为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的载体。由于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习俗，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以辜、许二人为例，两人都精通多种语言，许心美会说九种方言及外语，辜鸿铭更是大师，除深谙中国文化外，还可以用西文写作、演说，向西方人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西风东渐的大潮下，在中国大陆民众及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文化轻慢、怀疑，准备全盘地接受西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则相对冷静务实，崇尚自下向上的改革。比如辜、许二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务实、客观和自信的态度。身居海外的经历让他们对中西文化、社会制度等有着较全面的洞察，辜鸿铭自不必说，精通西方文化后更努力地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许心美也是一面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政经商，一面以开放的心态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和造福社会。

其次是经济实力的优势。辜鸿铭家境殷实，少年时期就得以往欧洲游历求学，这一优势在许心美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许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得益于许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许心美大刀阔斧

地引进改革、创新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才有了财力支持。就整个东南亚地区来看，19世纪70年代后，锡矿和橡胶种植为地方经济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华人资本与华人劳工又积极参与该新经济活动的开发，并成为先驱者（吴小安，2005）。这期间更有名的案例有英属马来亚檳城的福建华人五大姓（邱、林、谢、杨、陈），他们构成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以檳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舞台上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作为该地区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族群，通过对其掌控的跨国互联的企业和公司的控制，他们建立了覆盖檳城及其周边地区的业务网络，并延伸到加尔各答、香港和汕头。这些华人华侨为东南亚经济的兴旺蓬勃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最后是组织网络的优势。在东南亚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移民，往往倾向于自发地形成社会组织网络以提供情感和支持。辜鸿铭因为长期在中国国内生活，这一点体现不明显，但是从许心美身上则可见一斑。作为檳城和暹南华商集团的成员，许氏家族正是依靠华人族群和华商社团的组织网络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历史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组织，包括宗祠、商帮、会馆、公司等，加上商业伙伴关系、明智的联姻，在华人社区中构成了有效的组织网络，并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即使是被西方人看作秘密会社的“兄弟会”等，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如今这些组织网络已经融入所在国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盛毅 & 任振宇，2015）。

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华人华侨

1.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地区的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倡议,描绘了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中间广大腹地的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根据2015年3月经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如今,“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倡议已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其战略构想也正式进入推进建设阶段。

“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重点方向共有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张帆,2016)。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十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交通枢纽地位。同时,“一带一路”是以中国周边地区和沿线国家为依托,并且不断扩延的全球性发展规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省份及东盟十国(张睿亮,2016)。东盟十国将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

经贸与投资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重要的投资目标国。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内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华侨华人，各国的华侨华人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并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国现今推行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东南亚一带是极其关键的区域，东南亚华人华侨因其具备的优势，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和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一，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文化的兼容并包可为“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架起文化桥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可见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对“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各国华人华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华文学校、报纸刊物、宗祠社团活动、传统节庆等形式保持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存续，向世界展现着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华人华侨融通中外，又一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也了解所在国的实际需要和价值观，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并深化中外在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力度。此外，因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华人华侨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可以提供语言翻译、法律等服务，能起到良好的沟通作用，推动各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华侨和中国的联系将更为紧密，他们将成为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

第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经济实力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搭建了经济桥梁。经济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涵盖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三方面。如今东南亚新移民增多，传统侨团、华商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也已增强，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领域向贸易、工业制造、房地产、金融及高科技产业拓展。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实施，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将面临更多样的发展机遇，也为中国资金和项目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可以从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或是投资参与到中国具体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他们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在资本市场和企业规模方面的优势，参与并促进“一带一路”各类项目的建设。

第三，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健全的组织网络有利于增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策沟通”。东盟各国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在2007年人数就已达到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5%（庄国土，2010）。有了组织的保障，加上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生态的改善，华人华侨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上做出巨大贡献，加强政府间政策沟通和合作。借助于组织网络的优势，东盟各国华侨华人可以帮助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沟通”，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增进其所在国政府、社会团体及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支持。华人华侨讲述好“中国故事”，可以让各国对中国多一些了解，少一些猜疑，这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将会有不小的帮助。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东南亚华商可以从中获得商机，华人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施展才华，华人人文学者也可以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当今世界，经济缓慢复苏、

地区冲突不断、发展问题严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东盟国家的华人华侨，若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不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还会为该地区的稳定繁荣甚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本文从辜鸿铭和许心美这两位历史上杰出的华侨华人代表身上发现智慧、寻找启迪，希望探索出更加灵活多样、新颖务实的途径以发挥华人华侨的优势，这无疑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陈小二、陈宇峰.(1995). 论泰国华人对泰国社会的贡献.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4, 77-84。
- 黄兴涛.(1996). 辜鸿铭文集.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罗振玉.(1931). 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东北从刊, 13。
- 汪洋.(1998). 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族—兼谈东南亚华人同化问题. 东南亚研究, 3, 55-59。
- 沈燕清.(2013). 槟城福建华人五大姓氏饷码经营探析. 八桂侨刊, 4, 64-70。
- 盛毅、任振宇.(2015). 发挥东盟国家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中的桥梁作用. 东南亚纵横, 10, 28-31。
- 吴小安.(2005). 殖民主义、本土国家与东南亚华人移民: 中国跨国化的一些历史含义. 南洋问题研究, 121, 80-86。
- 张帆等.(2016).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第2页。
- 张睿亮.(2016). “一带一路”与中国时代和亚洲世纪的开启. 阿拉伯世界研究, 1, 第98页。
- 赵凤昌.(1931). 国学辜汤生传. 人文月刊, 2, 4。
- 赵麟斌.(2016). 略述福州华人华侨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闽江学院学报, 3, 1-6。
- 朱杰勤.(2008). 东南亚华侨史. 北京: 中华书局.
- 庄国土.(1992). 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人口结构. 南洋问题研究, 1, 第70页。
- 庄国土.(2008).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南洋问题研究, 133, 69-81。
- 庄国土.(2010). 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 研究与探讨, 4。

- Liang, C. (2013). KHAW SIM BEE AND THE NARANONG FAMILY: A SHARED HISTORY OF PENANG AND SOUTHERN THAILAND. *Penang Monthly*, (5), 8-12.
- Cushman, J.W. (1991). *Family and State: the formation of a Sino-Thai Tin- mining Dynasty 1791-1932*.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nlap, D. (1913). *PHYA RASADA: A Biographical Sketch*. Penang: Penang Gazette Press Ltd.
- Kantang City Municipality. (2014). ยางพาราต้นแรก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Retrieved from <http://www.kantangcity.go.th/travel/detail/32>
- Khoo, S. N. (2009). Hokkien Chinese on the Phuket mining frontier: The Penang conne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huket Baba communit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2, 81-112.
- Mackay, C. (2012). *A history of Phuket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 Bangkok: White Lotus Co. Ltd.
- Purcell, V. (1948).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G.C.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Vision and proposed actions outlined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Retrieved from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5-03/30/content_19950951.htm
- Wang, G.W. (195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Yip, Y. H. (196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n mining industr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